



《哲学与文化》丛书 | 江怡 主编

无以人灭天

——庄子思想研究

严春友 著

严春友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13068640

《哲学与文化》丛书 ■ 江怡 主编

B223. 55

59

无以人灭天

——庄子思想研究

严春友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B223.55

5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以人灭天: 庄子思想研究 / 严春友著.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161-3122-0

I. ①无… II. ①严… III. ①庄周(约前 369 ~ 前 286)—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23.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207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特约编辑 韩国茹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58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从文化自觉到哲学自觉

江 怡

中华民族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华文化的复兴被看做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在这个重要历史时刻，我们能否抓住机遇，在历史文化的厚重积淀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在传承文化的历史使命中创新自己的观念，在时代文化的多样变化中构建自己的特色，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历史挑战。把握好这个历史机遇，回应重要的时代挑战，不仅需要我们充分的知识准备，更需要我们的思想智慧。

当今中国的文化发展已经向我们表明，文化自觉的树立正在极大地推进着我们的社会发展，文化自觉的结果将改变当今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知道，这里的文化自觉首先是指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是自身文化意识的提升，也是社会大众对文化发展的迫切要求。思想上的认同并不等同于行动上的一致。只有当我们充分认识到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并努力从行动上体现我们的文化认同时，我们才能达到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更是指思想上的自觉，是我们在思想上真正形成对自身文化性质的理解，特别是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转型过程中的不同文化形态的认识，最后构建我们自身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里的特殊性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已经体现在当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上，因此，如何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体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时代效应。这里的普遍性是指，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必须得到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的理解，因此，这样的特殊性就必须以具有普遍意义的表达形式加以体现。只有在能够为世界各国文化理解和交流的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才能真正进入“自在自为”

的阶段。然而，要做到文化的这种自觉，我们必须抓住文化的核心和精髓，这就是时代的哲学思想。确立文化自觉的关键，应当是做到整个民族在哲学上的自觉。

中华民族富有哲学思维的传统，中华文化蕴含深邃的哲学思想。无论是《论语》、《道德经》，还是《中庸》、《大学》，这些代表着中华民族智慧的论著都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哲学思维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思想行动以个人认识为前提，观念形成以经验活动为前提。虽然中国哲学学科的自觉意识产生于西方哲学传入之后，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却始终哲学式的。中国人的智慧具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中国人善于从身边的具体事项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并总是试图用这些道理去理解其他相关或相近的事项，由此完成对事项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关注的是事情的过程，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的事物本身。第二，中国人对事物的理解更多地是从关系出发，更多地关注自己周遭生活环境中的的人和事，更多地考虑如何从各种关系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更重视整体和全局，而不是个体和局部。由此可见，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和智慧特点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对应：个人认识活动是以在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为根据和出发点的，因此，中国人的思维具有经验归纳的特征；而经验活动本身又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整体和全局，所以，中国人的思维又具有抽象普遍的意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并非出自我们的自觉意识，而是对前人长期生活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对中国传统思想表达的提炼升华。虽然我们一再强调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但是这种强调却是建立在我们理解了不同于我们思维方式的西方哲学的基础之上，是我们通过不同哲学之间比较的结果。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给我们带来了对我们自身哲学的重新认识，甚至是对自身哲学思维方式的重新定位，激发了我们全面理解自身哲学的浓厚兴趣。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中，我们开始形成对自身思维方式的自觉。

首先，哲学的自觉意味着我们对思想的主动认识。黑格尔说：“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他有思想。由此看来，人的一切

文化之所以是人的文化，乃是由于思想在里面活动并曾经活动……唯有当思想不去追寻别的东西而只是以它自己——也就是最高尚的东西——为思考的对象时，即当它寻求并发现它自身时，那才是它的最优秀的活动。”^① 思想正是在成为自己的对象的时候，哲学由此产生。因此，哲学的自觉本身就意味着思想。这里的思想并非完全是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活动，或者是对事物发展演变的规律性理解，而是以概念的方式对我们认识活动内容的抽象概括，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概念化表达。这种思维方式就要求思想以概念的方式形成对我们所认识的思想内容的表达和构造，也是对我们思想本身的概念规定。纵观我们目前的哲学思维，我们缺少的似乎正是这种对思想的主动认识。我们比较容易满足于对事物表象的理解，比较容易接受从经验中得到的知性认识，而不太愿意从概念的层面把握事物的根本性质。真正的思想应当能够在事物之上确立把握事物的基本原则，能够在经验之先具备理解经验的基本能力。正如黑格尔所说：“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做的劳动才能获得。只有概念才能产生知识的普遍性，而所产生出来的这种知识的普遍性，一方面，既不带有普通常识所有的那种常见的不确定性和贫乏性，而是形成了的和完满的知识，另一方面，又不是因天才的懒惰和自负而趋于败坏的理性天赋所具有的那种不常见的普遍性，而是已经发展到本来形式的真理，这种真理能够成为一切自觉的理性的财产。”^②

其次，哲学的自觉在于我们能够形成对事物的整体理解，能够从较高层面把握事物发展的基本态势。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③ 这种彻底不仅表现在理论本身能够自圆其说，更重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页。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8页。

③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要的是理论能够把握整体，能够从宏观上对事物有完整的理解。而且，这样的理论还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由此表明理论在实践中的彻底性。显然，这种哲学的自觉就要求我们必须认清历史的发展脉络，使理论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而这种前瞻和预见正是彻底的理论自身具备的本质特征。经验主义的方法只会使我们裹足不前，完全从经验出发就会使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有当我们真正形成了对事物的整体理解，只有当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我们才能从哲学的高度解释我们在经验中面对的各种现象，才能在事物的各种变化中把握事物的发展脉络。

再次，哲学的自觉还表现为对理论思维的自觉培养，表现为对以往哲学史的学习和理解。恩格斯说：“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①他指出，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形式。因此，只有通过不同时代的理论思维的学习理解，我们才能提升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这里的理论思维能力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科学思维能力，另一个是哲学思维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帮助我们对以往历史中出现的各种科学假说和科学思想形成恰当的判断，有助于我们认清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理论和思想的创新程度。但科学思维能力仅仅停留在或者说只能在对经验现象的表层理解，即使是对经验现象的科学解释也不过是采用了逻辑的方法，对这些现象重新分类而已。而哲学思维能力则对我们的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我们必须能够超越经验现象，通过对各种现象表面的理解达到对现象背后本质的把握。这就需要我们首先了解以往哲学史上所出现的各种理论观念，在历史的脉络中寻找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所谓新观念的历史踪迹。同时，这还需要我们具备超越历史和经验本身的抽象能力，能够从历史和经验中剥茧抽丝，形成我们自己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的理论观念，用于解释我们当代的现实问题，并提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最后，哲学的自觉更表现为对辩证法的自觉运用，表现为对“绝对真理”的放弃和对现实实践活动的最终关注。按照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思想的运动不过是绝对精神在人类思维中的变化过程。虽然这样的辩证法是以概念和现实存在的颠倒关系为前提的，但其中有一个重要思想却是我们必须牢记的，这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能够按照思维自身运动的方式理解事物的发展，也就是当我们能够自觉地运用思维的辩证法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思维活动如何与现实存在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也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把思维活动的最后结果放到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加以检验。这就意味着，辩证法不仅运用于思维活动本身，更运用于我们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用辩证的方式观察事物，解释现象，提出观念，形成理论，这些就是哲学的自觉表现。

从文化的自觉到哲学的自觉，这体现了我们对自身文化的更深层理解，是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负责态度。仅仅停留在文化自觉的层面，我们还只能从自身文化的特殊性上把握思想的力量，只能依靠我们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体会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而哲学的自觉则帮助我们概念的层次上理解思想的构成和变化，从思想自身的发展中把握观念的历史作用。从更广泛的当今世界文化的视野看，能够做到哲学自觉，才会使我们的文化自觉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行动，才会使我们自身的文化特征得到广泛的认同和理解。

本套丛书冠名《哲学与文化》，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因为文化是哲学的外在体现，而哲学则是文化的内在精神。我们将在本丛书中陆续出版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学者以及其他学科学者的最新著作，充分反映国内学者们在哲学与文化领域中的独特思考。

本丛书得到国家“985工程”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价值观与民族精神”的大力资助，特此感谢！

目 录

绪论 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考察	(1)
第一节 关于方法	(1)
第二节 各种方法中存在的问题	(4)
一 对古典研究方法的反思	(4)
二 考证方法	(8)
三 分块式研究	(9)
四 阶级分析和社会背景分析方法	(11)
五 辩证方法	(17)
六 西方哲学的方法	(18)
第三节 思想的特性	(21)
第一章 论庄子思想的性质	(26)
第一节 庄子的思想不是任何一种“主义”	(26)
一 庄子是否唯心主义者?	(26)
二 庄子是唯物主义者吗?	(31)
三 庄子是怀疑主义者吗?	(33)
四 庄子哲学是诡辩论吗?	(35)
五 庄子是相对主义者吗?	(40)
第二节 定性研究的局限性	(45)
第二章 庄子思想的不同层次及其作用	(47)
第一节 “相对性”的作用	(47)
第二节 道的作用	(52)
第三章 庄子的“道”以及今人对它的误解	(58)
第一节 道的含义	(58)

第二节 道的意义	(75)
第四章 庄子对人类之“知”的批判	(82)
第一节 《齐物论》的主题是批判人的概念式思维	(82)
第二节 通过知的途径不能达于真理	(88)
一 “知”使人类生活于可悲的境地	(89)
二 通过彼此、是非的争辩不能达到真理	(90)
三 通过概念的辨析不能达于道	(92)
四 通过概念和语言不能说清楚道	(94)
五 物性无常，不存在共同的标准	(97)
六 物化无常，人不能知其所以然	(100)
第三节 不知之知是最高的知	(104)
第四节 绝圣弃智	(109)
一 智慧扰乱了人心	(110)
二 智慧是中性的	(113)
三 以“小国寡民”限制人的“知”	(117)
四 有机事者必有机心	(120)
第五节 庄子对人类智慧批判的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	(121)
第五章 我非我有：无可奈何是人生的终极状态	(127)
第一节 有用与无用是不确定的	(128)
第二节 福与祸不可预料	(135)
第三节 死生无关乎己	(137)
第四节 名与利是人所不能控制的	(147)
第五节 以无限消解有限	(148)
第六节 我非我有	(153)
第六章 无为思想的意义	(158)
第一节 道之无为	(158)
第二节 无为，个人无奈的选择	(160)
第三节 君主无为的意义	(163)
第四节 柔弱中隐含着强大的力量	(169)
第五节 无为思想中存在的问题	(172)

第七章 庄子思想的当代性及其存在的问题	(174)
第一节 庄子思想中存在的问题	(174)
第二节 庄子思想的特性与《庄子》的不可研究性	(178)
第三节 庄子思想的当代性	(183)
附录一：中国哲学的强解释学特征	(194)
一 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的复杂性	(194)
二 中国哲学的强解释学特征	(200)
三 西方哲学的弱解释学特征	(203)
四 结论	(205)
附录二：境域中的非境域性	(208)
一 境域构成说不能消解二元化	(208)
二 境域构成说不能消解主体性	(211)
三 认识论也是不能消解的	(214)
参考文献	(220)
后记	(224)

绪论 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考察

考察以往对庄子思想的研究,可以发现,人们一般性的观念系统影响着对庄子的评价和理解,这个一般性观念系统作为判断的出发点起着定向的作用,它如同数学中的坐标,规定着思考的方向。它是隐含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的“前见”,制约着认识的过程。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学术界基本上以批判传统为主流,传统处于被否定的地位。批判,诚然是学术前进的动力,批判的目的在于超越,但如果完全否定传统,则我们就没有可以超越的东西了,也就失去了超越的立足点。庄子正是在这样一种“前见”的制约下被审视的,当一个东西处于被否定地位的时候,人们便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个东西,人们对于庄子的种种误解也正由此产生;由于存在着这种否定的张力,以至于那些肯定的观点也被扭曲了,因为它们是从否定这种否定的角度出发的,因而难免被其所左右。于是,超越这种“前见”,也就成了首要的任务,否则便没有说话的角度和框架。

因此,中国学术界对待中国哲学的一般态度就成为首先必须要考察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所蕴含的作为思考前提的观念如果不清楚,说话者的角度和立场就不清楚;角度和立场若不清楚,研究的出发点便不清楚,更无法去研究某个人的思想。而中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就是由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不清楚造成的。在这些根本的问题中方法或许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因为方法是研究的出发点。所以在这里将主要考察中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的方法问题。

第一节 关于方法

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普遍地比较注意方法的使用,“五四”以

来尤其是这样。除了传统的注释、解释方法以外，使用较多的方法主要有阶级分析方法和社会分析方法、辩证法、西方哲学的各种方法、比较法等。假如是富有创造性地运用这些方法，而不是把它们作为一种教条，那么对这些方法的运用本是无可厚非的。然而，许多人的做法恰恰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此，这种对于方法的运用本身就成了“问题”，那么其运用的结果也必然是有问题的。

这里存在的根本问题是，方法被看做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可以拿来现成地套用到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上。哲学家的思想本来应当处于主体的地位，是研究的对象，但在这种研究中却成了陪衬，哲学家的思想被装进了已经设定好的框架中，在研究之前结论便已经得出。这样的研究是没有生命力的，因而算不上真正的研究。真正的研究应当能够得出新的结论，而上述研究不过是在重复别人说过的话；而且在这样的研究中双方都受到了伤害——方法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被研究者也被肢解。

实际上，并不存在孤立的方法，或者说不存在一种孤立于思想活动之外的“科学的”方法，只要运用它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或发现真理。方法并不存在于思想活动之外，而是存在于其中。换句话说，真正的方法具有本体论或世界观的意义，它本身就是一种“存在”，内在于一个人的思想活动中。反过来说，本体论或世界观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一个人看待世界的观点，同时也蕴含着 he 看待世界的方法。所谓世界观无非就是看待世界和事物的方式，这种方式其实就是方法。方法既然是内在的，那么当一个人在运用某种方法的时候，他并不会意识到他是在运用这种方法，或者说，只有当他不知道是在运用某种方法的时候，这种方法的运用才算是成功了，也才算是富有生命力的运用。

人们一般承认，方法是研究的出发点。既然是出发点，那么它就是整个研究过程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出发点是不可能与它的过程相脱离的，它不能存在于过程之外，没有过程的出发点不可能是出发点。出发点不只是存在于过程的开端处，相反它存在于整个过程之中，与整个过程融为一体。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成为整个研究过程的

一种内在规定，也才富有生命力。那种与研究过程相脱离的方法则是死的东西，因为它不能与研究过程一起成长。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出发点或者方法，并不是一开始就现成地存在着了，而是与研究的过程一起生长的。方法的实质就是视野，有什么样的视野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视野由于与所研究的文本的视野相互交融而变化 and 扩展着，这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有机的过程，从而可以诞生出新的精神生命。因此才可以称之为创造性的研究。若没有新的精神生命诞生，那就不能叫做创造。

这样看来，方法应当是一种个体性的东西，而不是公共的、普遍的。公共的东西大多具有规范的性质，比如自然科学中的所谓方法多是这样的东西，实际上都是科学研究中的规范。规范本身还不能说是创造的方法，因为它不一定导致创造性的东西出现。能否创造出新的东西、有新的发现，主要并不取决于这种外在的方法，而取决于创造性的头脑。若没有这样的头脑，任何方法都是没有用的。所谓创造性，必定意味着它是一种个体化的东西，即别人没有的东西，如果你所说、所见的是人人都知道的，怎么可能是创造呢？虽然不能说凡是个体化的都是创造，但创造一定是个体化的。

这同时也意味着，创造性的研究方法就是没有方法。其含义有二：“创造性的方法”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创造的意思就是前无古人，既然前无古人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方法。假如方法已经存在，你只能照着去做，这本身就违背了创造的本来含义，这样做也不会有什么创造。它的结果在你进行“创造”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如何能说是创造？只有发现了未知才是创造。这是其一。其二是方法与创造的过程是融为一体的，因而感受不到在运用什么方法。创造的过程本身就是方法诞生的过程。

关键的问题在于创造，如果一种方法的运用可以创造出新的思想，它就是有意义的，否则运用多少方法也没有意义。然而，当人们把某种方法外在地应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的时候，是否创造出了新的思想呢？这是需要进一步考察的。

第二节 各种方法中存在的问题

不仅人们运用方法的态度有问题，而且各种具体的方法也存在着问题。应当意识到，任何一种方法都是有局限性的，即使你运用得当也是如此。既然方法只是某种视野的产物，就难以避免这种视野的局限。当我们运用某种方法的时候就应当知道这种方法的局限之所在，否则就会产生新的局限，这种局限还会反过来局限它的运用者——自我。因此下面将从一般意义上对以往人们所运用的主要方法进行考察，以便发现它们各自的优越之处及其缺陷，尽管这种单独考察方法的方法也有着自身的局限。

一 对古典研究方法的反思

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强解释特征，也即存在着解释过度的状况，总习惯于把思想活动看做是对前人思想的解释活动。解释本是一种“居中”的行为，但中国哲学的解释却偏向于文本一方，把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归于作者和文本。以肯定文本为主，思想的过程以对文本的解释为目标，将“我”融合到文本之中。故称之为“强”。

先秦时期是中国哲学的创造性阶段，秦汉以后的哲学活动则基本上是以解释为主，解释活动几乎被等同于思想活动。具体地说，就是以作者的思想和文本为解释的中心，以作者和文本的原意为解释的目的，假定存在着与理解者无关的孤立存在的意义，而种种解释的技术和方法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被发明出来的。这种解释一方面把自己的理解活动也归纳到解释的范畴之中，泯没了解释者的创造性和个性，另一方面则过度地强调了文本的独特性，因而停留在消失了的历史本身之中。解释学强调整理解和解释的历史性，认为不仅文本处于历史的境域中，而且解释者也处于历史的境域中，理解和解释的历史性是理解和解释的前提，但是不应由此就把解释的结果完全归于文本，相反在这种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形成了原来没有的新的视域。中国哲学所理解的历史性则是僵死的，是文本本身的历史特性。自秦汉以后

的哲学著作越来越重视阐发古人的思想，汉朝的章句之学就不用说了，以后的著作虽然没有那么繁复，但解释的篇幅大多远远超过了原文，人们创设了“传”、“记”、“说”、“解”、“注”、“笺”、“疏”等解释体例，以便消除人们的误解和偏见，恢复或弄清文本的原意。这样，后人的理解就定格在了文本的框架之中。

虽然在这些解释中也有发现，有新的进展，但这种强解释学特征使得这些有创造性的东西淹没在文本和考证的海洋里，这种态度也束缚了解释者的创造性。

在这样的著作中存在着两种历史性，一种是文本本身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即文本或作者自身的本意，一种是对文本理解和解释的历史，几乎每一句话甚至一些重要词汇后面都汇集着历代解释者的理解。后者是为前者而存在的，是为了使前者的“真”得以显现。于是，历史几乎静止在了文本的时代，解释者忘记了自身的历史性，忘记了他的解释只是一种历史对另一种历史的解释。历史在这样的理解和解释中实际上定格在了文本的时代，从而妨碍了创造的活力。历史性的含义就是时间性，也即创造性，只有在富于创造性的变化过程中才有历史，而对于历史性的过度重视使人们的思想停留在过去的某一个历史时期或某种思想中，于是创造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被扼杀了。可见，过度的历史性反而窒息了历史的进程。

这种过度的解释造成了许多后果：

其一是哲学的进展非常缓慢，原因就是由于人们过度地重视了解释，把哲学研究活动看做是对前人思想的理解和解释活动。中国哲学的这种强解释传统把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完全归于文本，只在文本的视域内思考问题，即使是有了自己的心得也必定要以原文的语言来解释或归结到原文的思想框架之内。

其二是哲学的发展是寄生式的。由于这种强解释传统，哲人们不敢否定前人的观点，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后人以继承和阐发前人的思想为主，后来的思想总是寄生在前人的思想之树上。解释者——我，被消融于文本的视域之中。

其三，由此决定了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式是线性的，表现为中国哲

学的流派是贯穿古今的，没有新的哲学流派出现，即使有新的观点，也是对古代哲学观点的修补，所以只能冠以“新”字，如“新儒家”、“新道家”之类的名称，但基本的哲学原则并没有变化，还是在这个学派的框架内，本质上不能算是新学派。这种线性发展还表现为哲学范畴也是贯通古今的。由于没有突破原来哲学思想的框架，所以只能使用原来的范畴，如道、气、五行、阴阳、仁、义、礼等范畴，自古已存，人们思想的不同仅仅表现在对这些范畴的不同理解和解释上。

其四，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过度的解释风气形成了尊师的传统，而且这种尊师是一种全面的尊重，不仅尊重老师的人格，还包括尊重老师的思想，由此导致了对于师承关系的过度重视，以至于在思想活动中过度地看重传承，而缺少批判精神。缺少了批判精神，也就难以对前人的思想有所超越。从一般意义上讲，在中国哲学的这种过度解释中，理解者的主体性被忽视了，它被溶解到客体性之中，变成了文本的附庸。

应当说，中国哲学的这种过度解释的传统、这种肯定式的发展方式，严重地束缚了哲学家的思想，压抑了他们的创造性，妨碍了中国哲学的进展。尽管人们也试图提出新的观点，但由于是将自己的思维活动定位在阐发先贤的思想上，因而无论如何也难以突破文本的视域，缺少整体性的创造，只是在原来的框架中修修补补，后人的思想只能被包含在前人的思想和文本的视域中。中国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只在先秦出现过，那时的思想界如同百花齐放一般灿烂，从思想到文字都充满了无限的生机，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宏大的气度。而自秦汉以来便江河日下，注释之风形成，那种宏大的意识消失了，再也难以找到孔孟老庄式的人物和《论语》、《道德经》、《庄子》与《孟子》那样气魄宏大而自成体系的著作。能够有些灵气的人物和文字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还稍微能够保持着较多灵气的学派，只有禅宗了。宋朝的理学虽然成一时之风气，但从思想到文字都远远不能与先秦诸子相提并论，他们的思想缺少生机和朝气，思想的阐述越来越概念化，给人一种机械、教条、生硬的感觉，而文字文不文、白不白，读之如嚼